

最好有个“临时价格干预报告”

■今日视点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物价持续走高,猪肉、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是一天一个样。高昂的物价不仅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而且也给了政府出了道难题。最终,发改委等部门对猪肉、食用油等民生类商品出台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如今物价趋于平缓,包括食用油在内的民生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好像也到了终止的时候。

果不其然,国家发改委1日宣布,自12月1日起解除年初对成品粮及粮食制品、食用植物油、猪肉和牛羊肉及其制品、乳品、鸡蛋等食品类商品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

(12月1日《新华网》)我记得,当时政府出台临

时价格干预措施的时候,曾经引来了一些专家和媒体的疑问:政府在不完全竞争的领域伸手干预,会不会伤害好不容易形成的市场自我调节能力?面对这些疑问,当时发改委等部门曾专门予以说明:临时价格干预是为了舒缓民生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并不意味着政府会对完全竞争的商品领域进行常态化的行政干预。应该说,这种应急的临时价格干预,对于受高物价困扰的百姓来说是很有必要的,美国如此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次贷危机发生之后,政府也不断“入市”给银行等金融机构注资,购买它们的不良资产。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完全与政府干预绝缘。应该说,这是没什么好争论的。事实上,我国自年初实行民生类商品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以来,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下半年CPI一直维持在低位运行,猪肉和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一跌再跌,就是最好的说明。现在发改委解除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说明物价调控的压力已经趋缓,高物价已经不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解除干预,也算是应时而为了。

只是我认为,取消临时价格干预这么一个关系民生的重要举措,发改委最好还是给出详细的报告,而不仅仅是发个简单的“取消干预”的通知了事。这个报告里面应该有什么内容呢?我想,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实行大半年以来,对物价调控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应该是其核心内容。不妨拿食用油来做例子。我们知道,在临时价格干预措施里面,食用油要涨价是要经过物价部门审核和备案的,而在此期间,

也确实发生了几大品牌食用油欲涨价的事情。那么,在控制食用油涨价的事情上,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报告中应该详细列明。除了食用油之外,其他受到临时价格干预的商品,其涨价的冲动在多大程度上被遏制了,报告中也可以详细列明。

有了这么一个实施报告,关系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临时价格干预,才能清清楚楚地让大家感觉到它的好处。否则的话,如果大家都以为物价下降完全是成本下降的原因,临时价格干预并无寸功,岂不糟糕?再说了,谁也不能保证今后就不需要临时价格干预,现在通过报告把临时价格干预的合理性和作用说清楚,以后再搞临时价格干预,也就不会引来这么多疑问了吧。

(尹之)

“考察清单”恐无法倒逼费用公开

【媒体思想之曹林专栏】

这几天最热闹的莫算“考察清单泄密事件”了:一个网友坐地铁时偶然捡到了某市官员的出国考察清单,这些清单暴露出“到赌城考察人力资源”、“大多考察的是旅游景点”等许多见不得人的秘密。媒体的追踪调查曝光了隐藏在清单外更多的秘密,让一场考察腐败更全景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比如温州培训团住的酒店一晚700美元,21天的考察行程绝大部分是参观著名景点……

(11月30日《中国青年报》)感谢旅行社不小心遗失的这些清单,它以鲜活的案例再一次证明了没有纳税人监督的所谓出国考察是多么的奢靡挥霍和腐败无度,所谓的“邀请考察”纯粹是掩人耳目,所谓的“严厉监管”不过是形同虚设,所谓的“丰硕考察成果”不过是胡编滥造。更

可怕的是,清单暴露出公费出游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链利益链:从对方发出邀请,到代写出国申请,到行程安排,甚至到最后代写考察报告,旅行社都提供一条龙服务。

偶然遗失的清单,暴露出纳税人监督缺位的出国考察这么多腐败,暴露出自我监管形同虚设。有人问,抓贼拿脏抓奸拿双,这次公费旅游可谓被公众抓实在把柄,鲜活的物证能否倒逼有关部门公开出国考察费用呢,公众反腐不能总指望通过出门捡清单的方式守株待兔吧?这是纳税人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有关部门和许多官员的脸皮厚着呢,别指望几张小小的清单就能倒逼他们公开考察清单。

其实,即使没有此次偶然遗失的考察清单的证明,出国考察中的腐败也早就众所周知,只是没有考察清单这么具体、详细和有冲击力罢了。对

于这种“明摆着”的腐败,几张不小心遗失的清单又怎能轻易终结,这未免太低估了那些官员的抗打击能力。

更重要的是,公款出国旅游已经成为某些官员一种半公开化、半正当化的既得利益,不仅仅是一种官场潜规则,在许多地方甚至已成为一种半公开的官员福利:或者大家每年轮流利用公款出游一趟,或者把公款出游当做奖励的手段,或者有部门小金库作为公款出游的基金,甚至是用公款寻租换来的变相的贿赂——正因为这种既得利益已经像公车私用、公款吃喝那样“半公开化”,所以温州市委组织部员在丑闻曝光后接受采访时毫无愧色、心安理得地宣称“考察赌城很合理”。几张小小的清单,绝不会让他们甘心接受纳税人监督,放弃这么大的既得利益。

还有,许多比出国考察更

腐败、更重要的费用都还没有公开,还没有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怎么会轮到出国考察费用呢?按理说,《政务公开条例》实施后,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政府的公务招待费应当向纳税人公开吧,可在舆论呼吁下政府一再置之不理;政府的财政预算应向公众公开吧,可人大喊了几年等于白喊;购置公车的费用应向公众公开吧,可至今对纳税人来说仍是秘密——有这么多“公款秘密”当挡箭牌,出国考察大可以高枕无忧,凭什么单独让出国考察公开啊?要么就全保密,要么就全公开,财务公开只能整体制度推进,绝不能寄望某个领域单兵突进。

所以,此次的清单丑闻,最多只会让几个竟然没保密好自身考察费用清单倒霉鬼暂时丢官,根本不可能倒逼费用公开、对制度产生什么冲击。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编辑)

“同学告教授”应有下回分解

■热点纵论

近日,在各大论坛博客上,一条题为《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的帖子引起网友热议。帖子转载了一篇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杨师群教授于11月24日的博客文章,博客透露两名女大学生到上海市公安局和市教委检举他在上课时有批评政府等内容,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

(12月1日《新快报》)杨师群教授在课堂上究竟讲了什么样的批评政府的话,我们不得而知;唯一知道

的是,杨教授批评政府引起两名女大学生的不满,两名学生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有关部门对此立案侦查。

大学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场所,在批评政府已经不再是什么禁忌的当下,一个大学教授批评政府不该受到激烈反应;但两名女大学生,应该也不至于迂腐到容不下教授批评政府的声音;而有关部门更不至于糊涂到立案侦查的地步。遗憾的是,由于没有相关信息的披露,仅仅凭借杨教授的博客——《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后又

被删除)的一面之词,让这起事件扑朔迷离。

“同学告教授”之所以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在于这一事件给人的感觉是,大学这一言论自由的场所似乎受到了破坏;而杨教授在其《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博文里,也是类似感慨:“这种事情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并且发生在中国的大学里,这就太让人匪夷所思了。”现在,一个不明不白、不清不白的“同学告教授”事件给公众一个印象(很可能是假象):政府不宽容——对大学教授批评政

府的声音竟然会“立案侦查”;学生过于迂腐——对教授课堂上的异声中国大学生竟然举棋“反革命”;大学言论不自由——中国大学在言论自由的外在环境上竟然如此不宽松。显然,这一糊涂的“同学告教授”事件,无论是对政府、对大学生,还是对中国大学而言,都是一种伤害。

因此,面对一头雾水、不明真相的公众,面对由此可能对政府、大学生、中国大学造成的伤害,需要“下回分解”,即将这一“同学告教授”事件彻底公开。

(王攀)

个税起征点并不是越高越好

■热点纵论

每次有个税调整消息传出,各路专家都会抢着表达意见,如同鸡尾酒会上羞于沉默的嘉宾,对准起征点侃侃而谈:3000哪够啊,起码4000-5000;但旁边更大胆的会接过话茬,我看8000才合适。还有更疯狂的吗?有,已经有人喊出10000的价码了。

大家好像本能地认为,个税起征点越高越好,那意味着交更少的税,自己的钱包越来越涨。但天底下若真有这样的好事,不妨更彻底一些,把起征点一步到位调到10万如何?大家欢呼吧!可有

个事实是不容回避的,政府是个纯属花钱的机构,它不产生一分钱利润(理论上),一分钱收了,它将拿什么来回填这个窟窿?

有两种选择,一是从其他方面征更多的税回补,二是压缩公共开支。第一种选择现在没有讨论的价值,第二种选择目前是最选项,那么,在一片欢呼声中,大家有没有想过政府将会如何压缩公共开支呢?

在这点上,很多人抱有天真的想法,压缩公费出国、公车消费、公款吃喝、降低行政成本是最理想的目标,一方面减轻了公民税赋,一方面治理了公务腐败,可谓一举两得。

但哪有如此遂人意的啊。

事实很可能是,行政成本、腐败成本不会因个税起征点的调整而受到半点的影响,倒是诸如教育、公共卫生、环保、扶贫、社会保障这些一向饱受挤压的公共开支最先挨了刀,若结果难免是这样,那么,不知道这有什么好欢呼的。如果在财政预算表单上个税一项画个减号,在教师待遇上也画个相应的减号,这就是减税的全部意义所在,那么这只是个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

专家一个个把个税起征点向荒唐的数字喊,俨然一副民意代言人的模样,群众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可能会“不明真相”,可专家们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他们不会致力于让民众明白真相,而是致力于如何利用这种“不明真相”,不惜手段地博取民众的欢呼掌声,虚作声势地“替民众与政府争利”。这实则是在调戏民众:减税就是民众与政府争利吗?或说,税是政府的利吗?

(范大中)

投稿邮箱:wfwcbxyh@vip.sohu.net
电话:025-84783646

楼市该不该救亟须共识

【财经纵横之叶檀专栏】

楼市必须救,否则会把中国实体经济与消费拖下水。救楼市一是可以增加实际投资稳定实体经济,二是可以减少银行风险,三是可以稳定资本市场。

但有关部门对于楼市持有不同见解,现在亟须弥合分歧,统一意见,共同救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11月28日表示,今年下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比去年同期下降一成五至五成多。政府会寻求更多政策调整,务求令楼市尽早走出低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经抛开遮遮掩掩的态度,公开支持地方政府救楼市。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健堂也在12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撰文指出,中央政府将消除消费瓶颈,拓宽消费领域,稳定车市、楼市和股市。

如果说前两者主张救市的话,在全国率先抑制房价的深圳市长许宗衡则拒绝救市:“深圳还没有到需要政府对房地产实行救市的时候,我们经过讨论,还是没有出台救市政策,但会依法规范管理房地产业的发展”。

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恶性循环,商品房供过于求,银行惜贷,房地产开发商降价求售,导致资金链更加紧张。据中国最大投行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在目前的成交量下,要消化全国15个主要城市商品房现有库存,需要27个月的时间。中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秘书长、明天花信华投资公司副总裁陈云峰则认为,业内已经认可房价下降30%,销量下降40%这种说法。仅靠市场自我修复,房地产严冬将持续两到三年。

住建部关注的是商品房投资减少,希望促使更多地产商开工。我国房地产市场土地、开发、销售都与市场捆绑在一起。目前,万科等地产商纷纷歇工,这意味着占

今年的作家富豪榜有点寒酸

■公民发言

金融危机年代,贬值最快的词非“富豪”莫属。经济消退不仅让以往这两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变得斑驳陆离,也大大降低了富豪的准入门槛——假如你是一位写字的人,恰好今年的版税收入能有100万的话,那么,就可以被称为“富豪作家”了。12月1日公布的2008年中国作家富豪榜,明白无误地证实了这一点。

郭敬明比去年多200万的收入继续雄踞作家富豪榜第一名,但这丝毫不让人觉得是一个风光的榜单。非但不风光,今年的榜单看上去还很寒酸,排名最后一位的李西闽,收入是100万元,而去年作家富豪榜垫底的贾平凹,收入是150万元,一年时间,富豪作家的收入缩水了50万元。

导致这个寒酸榜单形成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百家讲坛》的集体没落是原因之一,“讲坛一姐”于丹去年还以1060万的收入名列第二,今年就落到第七位了,而“讲坛一哥”易中天更是从第三名落到第23名,其一落千丈的步伐可谓与《百家讲坛》非常同步。围绕《百家讲坛》所形成的通俗历史书出版热,曾给图书市场带来一股热闹繁华景象,如今大潮退去,终于可以看到谁在裸泳了。

虽然没体现在富豪榜名单上,但崛起的网络作家群体,也正在瓜分着阅读行为带来的收入。低龄读者喜欢在网上阅读,也给图书出版带来了重创。如果明年上榜作家的收入比今年还低,也不要觉得奇怪,那只是意味着,中国文学还不具备形成一个文化产业所需要的基础和底蕴,中国作家还不能够让更多读者心甘情愿地为他们买单。

(韩浩月)

固定投资比例25%左右的商品房投资支出下降,与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背道而驰。房地产还可能带动消费进一步下降,1998年为走出紧缩经济周期,以房地产扩大内需是重要部分。最后,就是从建设保障型住房出发,政府也必须想办法维持楼市稳定,否则支撑保障性住房的数千亿元支出将成无源之水。

不稳定楼市,银行风险也会增加。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8月份,中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扩大到3.4万亿元,其中90%以上的部分是过去1-4年中贷出去的,个人住房贷款中头3-5年是还贷高危期。如果房价跌到重置成本以下,优质的个人房贷将出现重大风险。

深圳当年抑制房地产泡沫曾受到舆论欢呼,但目前继续对楼市吹冷风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深圳市政府不能为顾及地方政府的高大形象,不能因为深圳财政收入构成中土地收入已经下滑,而对重要行业的崩溃无动于衷。

深圳硬挺着意思不大。事实上,就在深圳宣布不救市的同时,广州却反其道而行之,广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表示,从2008年12月1日起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最高额度,个人最高额度为50万元;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购买同一住房,最高额度为几个申请人的可贷额度之和,但合计不超过80万元。

公积金是低息房贷,此举意在向消费者提供比银行更低的贷款,以刺激消费。

房地产市场有自身规律,出于市场惯性,受货币、景气周期、税收、预期等各方面情况左右,即便政府重拳救市,房地产市场也将继续下滑一段时间,但政府的挽救政策能带给市场信心,绝非可有可无之举。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

反腐老靠枕边人可不行

■公民发言

有“一夫多妻区委书记”之称的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原区委书记董峰受贿案,日前在徐州市中院开庭审理。

(12月1日《新华网》)这个区委书记是因发妻的举报而落马的。9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引述董峰之妻唯传侠的话称,董峰的情妇先后有支某、王某、黄某、陈某等,公开的就4个之多。如果不是其发妻忍无可忍,愤而举报,我们或许是永远不知道他的贪婪史——从其担任某镇党委书记时,就开始伸手,直至达到其仕途最高位(泉山区区委书记)案发时止。

无论董峰的发妻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她都成了“反腐英雄”。在“卧底”了许多年之后,她终于为我们引爆出一位隐藏了30多年的贪官,让我们从董峰的人生轨迹

中,清晰地看到了一位官员是怎样一步一步,从一个镇党委书记,带病提拔为徐州市铜山区委组织部部长、徐州市泉山区区长、区委书记的。我忽然在想,长期以来,当地的纪监部门之所以对董峰的荒唐和可疑视而不见,难道也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反腐策略?假如董峰的发妻不举报,再忍耐几年,等到董峰官至省一级再收网,届时一举抓一个大家伙,反腐成果岂不是更辉煌!

看来,动员情妇或发妻来反腐,虽然落实的机会不大,但也常常能收到意外的效果,有的时候,他们的作用一点都不比那些失聪的反腐机关小。我的意见是,我们完全可以将以“情妇或发妻”开辟为新的反腐战场,只是,隐藏了30多年的贪官被发妻举报落了马,不知道那些本该心眼亮的反腐部门会不会感到一丝羞愧。

(张兰英)